

不朽的兵学圣典

——《孙子》鉴赏

《孙子》亦称《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有“百世兵经”的美誉，而且是享誉世界的军事名著，这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千百年来，《孙子》的校勘、注疏、阐释之作不断涌现，数量之多是其他任何兵书所无法企及的，然而要真正读懂《孙子》却殊非易事。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孙子兵法》毕竟是 2500 多年以前的产物，其所用文字、所涉及的历史文化背景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今人理解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二是《孙子》是从哲理的层面研究军事问题，《孙子》研究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成为一种文化积淀，如果离开了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则难以把握其脉络和实质。

有鉴于此，我们在这里不再局限于对《孙子》的文意解释，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来解读，以期帮助广大读者从一定深度和广度来透视《孙子》这一兵学名著，并进而得以踏入传统兵学的大门。

本文拟分四个部分，着重介绍《孙子》产生的历史背景、孙子其人、其书、孙子兵学体系以及《孙子》一书的深远影响。文后附有《孙子》原文及白话译文。

一、战争的沃野 文化的春天

——《孙子》产生的历史背景

任何理论著作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孙子》当然也不例外。《孙子》产生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末期。这一时期,一方面战争开始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军事领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学术下移和思想解放,文化领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从而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为《孙子》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秋末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演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其间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西周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礼乐文明,至此终于由逐渐式微而走向分崩离析。

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体现为军礼,其内容包括诸多方面:征伐大权掌握在最高统治者周天子手中,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军队的规模有严格的限制,依次为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至于无军;发动战争要“不加丧”(不在敌国国君等重要人物丧期发起进攻),不因凶(不在敌国出现灾难时发起进攻);交战时要约时、约地而战,实施“偏战”(正面列阵作战);不鼓不成列(不在敌人列阵完成前击鼓进攻);对待敌方要“不重伤”(不伤害受伤的敌军士卒);不擒二毛(不俘捉头发花白的老人);战胜之后一般不能灭亡其国,而要讲求“兴灭国,继绝世”。如此等等。这一军礼制度虽在一定的时期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它从本质上扭曲了战争领域的自然规律,对兵学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它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历史陈述。

西周是军礼制度的鼎盛时期。从春秋开始,由于血缘宗亲关系

的淡化和周天子权威的下降 军礼制度逐渐走向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遭到破坏 各诸侯国为争夺霸权而相互征伐 大国争霸成为整个春秋时期战争的主要内容。在春秋近三百年中，凡见诸记载的大小战争竟达 480 余次，频繁程度可想而知。战争的内容则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

一是军队数量越来越多 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自春秋中期始 伴随着井田制的破坏 国、野之分渐趋泯灭，“国人当兵 野人不当兵”的兵役征发原则遭到否定 大量“野人”被编入军队 使各诸侯国的军队数量激增，旧军礼对各诸侯国军队数量的限制已被彻底打破。晋楚城濮之战 仅晋军就出动兵车 700 乘之多。如此规模，在西周乃至春秋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孙子·作战篇》言称“十万之师”说明至春秋末期 大国征战出兵 10 万已是相当普遍的事了。

二是军队的成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自商、周至于春秋初期 军队主要是指车兵而言，由战车上的甲士和从属于战车的徒兵组成。甲士一般由贵族充当，配备有精良的青铜兵器，是作战的主体力量；徒兵则由普通“国人”（平民）及少量奴隶充任 配置木石兵器 战斗力很弱。春秋中后期 由于井田制的破坏 大量“庶人”获得了相对的人身自由 成为农奴。出于扩充实力的需要 大批农奴被编入军队 徒兵数量由此而激增。农奴具有较高的从事战争的积极性，再加上武器装备相对改善的因素 使徒兵的战斗力有所增强 使之逐渐摆脱了对车兵的从属地位而再次成为独立的兵种，步兵重新崛起。由于步兵较之于车兵具有更强的机动性和地形适应性 至春秋末期 它已迅速发展起来，并呈现出一种取车兵主导地位而代之的趋势。与此同时 水兵也在南方吴楚地区逐渐发展起来 成为春秋末期的一个重要兵种。

三是作战方式的变化。春秋中期以前，由于车战占绝对主导地位 出于战车驰骋的需要 作战往往在平原旷野进行 以堂堂之阵实施正面会战 即所谓的“偏战”。后来 随着步兵战斗力的增强 更由

于其较之于车兵具有更强的机动性和地形适应性，作战方式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作战空间从平原旷野开始向外延伸，迂回、侧击、包抄、设伏、奇袭等新的作战样式纷纷登上战争舞台。要塞战、城池攻防战也初步进入了角色。

四是战争观念的更新。春秋以后，旧军礼渐趋式微。如果说齐桓公迁邢、封卫、救燕之举尚可为人们广泛称颂并有助于其实施霸业的话，宋襄公泓之战中‘不鼓不成列’的做法则遭到司马子鱼等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并成为其图霸失败的重要原因，至于城濮之战晋文公‘退避三舍’便完全出于战略的需要。所谓履行流亡楚国时的诺言完全是虚饰而已。及至春秋末期，出奇用诈已成为军事斗争中的常用手段。鸡父之战中的晦日出兵，笠泽之战中的示形突破，使诡诈之道在战争中叠放异彩。大量使用间谍，以惑敌误敌，更是对旧军礼制度的彻底否定。越国采取一系列韬晦之策，疲敌误敌，最终灭亡吴国便是明证。

战争领域出现的崭新气象，使得被旧军礼扭曲的军事规律得以恢复其本来的面目，从而为《孙子》这部理论巨著的产生奠定的坚实的实践基础。

和战争领域的深刻变化一样，对《孙子兵法》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春秋末期文化的繁荣，其标志是朴素唯物论的萌动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发展。

西周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和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制约，文化乃是王室贵族的专利品，对于平民甚至普通贵族而言，是不具备从事独立学术研究的条件的，更不可能著书立说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一特定的文化格局，史称‘学在官府’。

春秋以后，随着周天子权威的下降，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社会矛盾激化和权力斗争的结果，极大地调整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许多原来的贵族失去以往的特权，下降为小生产者。这一趋势在春秋中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些没落的贵族中，有许多是原

来从事文化教育的官吏。他们在失去贵族地位、沦为平民的同时，也将文化带到了民间，从而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文化领域的这一变化，史称“学术下移”。对此，孔子曾感慨地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春秋末期，民间学术活动空前活跃，私学勃然而兴。鲁国的孔子、郑国的邓析都是著名的私学创立者。孔门之下，从学者竟有 3000 多人。这时，除了官修史籍政典外，私人著述也开始问世。“学术下移”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士”这个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分化，即由原先以武士为主体的士阶层中，分化出以著书授徒为主业的文士，而且渐渐成为士的主体构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出现并开始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的一些精英脱颖而出，成为诸子学术的先驱乃至创始人。春秋末期，儒、道两家勃然而兴，早期法家也相当活跃，其他尚未形成学派的，也各逞异说。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已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上古史中，神学思想曾长期占统治地位。中国的神学以卜筮为主要形式，其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即认为在自然之外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神的力量，决定着世间的一切，天与人之间是相互感应的：上天通过种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将自己的意志垂示给人类；人们只要按上天的垂示去办，便可以趋吉避凶。形形色色的卜筮，便是沟通天与人之间的桥梁。

西周以前，卜筮活动非常盛行，通过卜筮进行决策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系因刻写在龟甲和牛骨之上而得名。迄今发现的殷商时期的卜龟、卜骨，便达 15 万余片之多。作为专司卜筮职业的“巫”在上古统治集团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卜筮的盛行甚至很早便导致了卜筮理论著作的问世，《周礼》所谓的“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较之于其他著作的出现明显要早得多。

卜筮的产生和盛行，反映了先民们这样的相互矛盾的心理：一方

面是感到在自然面前十分渺小 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又在积极探求自然规律 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卜筮在走向鼎盛之时，也便孕育了自身的反动因素。这些思想一旦从神学的襁褓中脱离出来，便成为朴素唯物论思想的重要源泉。这一天在春秋末期终于来临了。

春秋末期 伴随着学术繁荣局面的出现 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天道”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老子着力于以自然之道代替神学中的天道 孔子则有“不语怪、力、乱、神”的说法 子产更明确地提出了“天道远 人道迩 非所及也”的著名论断 这些思想标志着人们开始由重天道向重人事、自然的转变。军事领域在反天道方面则走得更远。一次 楚国的公子心率军与齐军作战。时有彗星出现 柄即彗尾 指向齐国的方向。按照卜筮的理论 柄指向的一方将获得胜利 因此有人建议公子心不要与齐人作战。公子心回答说：“彗星何知？以彗斗者 故倒而胜焉。”对神圣的卜筮理论采取了近乎嘲弄的态度。

春秋末期的反天道精神，对孙子无疑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可贵的是 他在这场反天道的斗争中 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体现出比较坚决的朴素唯物论精神。《孙子·用间篇》明确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 成功出于众者 先知也。先知者 不可取于鬼神 不可象于事 不可验于度 必取于人 知敌之情者也。”不仅如此 他还提出了在“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基础上 通过对敌我双方诸因素综合比较来预见战争胜负、进行战略决策的“庙算”理论 对朴素唯物论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与朴素唯物论思想产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长足进步。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对于“道”的内涵，先秦诸子虽各执一词，分别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给以不同的阐述，如老子的无为之道 孔子的中庸之道 但如果我们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表象，便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仍有其不变的特质。对此，《易经·系辞上》道出了真谛：“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就是说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两个方面 整个世界的形成 便是阴阳

二性相互依存又相互渗透的结果。阴阳之道乃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核心内容。

阴本指物体背日而言，阳本指物体向日而言。经过哲学家的提炼，阴阳便从具体的物上升为具有一般意义且统率万物的哲学范畴，这一过程至晚在春秋末期已经完成。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这里的阴阳显然已具备了哲学层次的一般意义。任何事物都具有阴阳二性，也即处于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因此在春秋时期的典籍中便出现了许多对立统一的范畴，诸如刚柔、有无、明昧、利害、吉凶、成缺、雅俗、安危、动静、虚实、奇正、表里等等。这一独特的范畴群，构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春秋时期的哲学家不仅认识到事物的阴阳二性，即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而且朴素地认识到事物总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周易》的“易”最根本的含义便是变易、变化，正如《易传》所指出的那样：“《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春秋时期出现了许多关于事物运动变化的辉煌命题，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范蠡的“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史墨的“物生有两”、“社稷有常奉，君臣无常位”等。这些命题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都揭示出：矛盾对立面是相对的、相比较而存在的，并各自蕴含着相反的因素，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转化、循环往复乃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规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子和范蠡。《老子》一书形成了历史上最早的、较完备的辩证法思想体系。它认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任何刚强的事物都蕴含着衰败乃至灭亡的契机，而处于柔弱、卑下的一方则往往拥有真正的强大的力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老子不但认识到矛盾转化的规律，而且认识到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矛盾双方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之中，总有一方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老子看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总是处于柔弱、卑下的一方，因而主张贵柔、守雌，以退为进，并由此而建立起自己的“柔弱胜刚强”的刚柔论思想体

系。范蠡则充分注意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事物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在这里范蠡不再像老子那样将事物的转化看成是必然的过程，而是十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要积极创造条件，使事物向着有利于己的方面转化。这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春秋末期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进步，对于《孙子》一书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孙子正是用朴素辩证思维来思考军事问题的。《孙子》十三篇，充满了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其中，如“杂于利害”、“以迂为直”、“虚实转化”、“奇正相生”、“常变结合”等命题，都反映出孙子对辩证思维的体悟是何等深刻。

二、穿破迷雾见青天

——关于孙子其人其书

《孙子》是中国传统兵学理论的一座丰碑，对此，世人殊无异议。但关于该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等，则长期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记述孙子其人其书的最早的权威资料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其中写道：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

这里司马迁明确了三点：历史上确有孙武其人，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出仕于吴，孙武所著兵法为“十三篇”，这恰与今本《孙子》篇目相同。

对于《史记》的这一记载，从两汉至于隋唐千余年间并无异议。至宋代时，学术界刮起了一股疑古之风，一些人开始对孙子其人其书产生了怀疑，并由此揭开了关于《孙子》一书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大争论的序幕。

首启对孙武著作权怀疑之端的，是北宋的梅尧臣。他认为《孙子》并非孙武亲著，而是“战国相倾之说”（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三《孙子后序》），南宋叶适继其后，以孙武“左氏无传”（即《左传》没有关于孙武的记载）为由，断言“凡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指，非事实”（《习学记言》卷四十六《孙子》），陈振孙也随声响应：“孙武事吴阖庐而不可见，《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

对于宋人的质疑，明代似乎罕见有人附从，而清代以后附和者则不乏其人。全祖望认为：“水心（即叶适）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者，可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鮚埼亭集·孙武子论》）就连考伪专家姚际恒也不无怀疑地说：“然则孙武者，其有耶？其无耶？……其书自为耶？抑其后之徒为之耶？皆不可得而知也。”近人金德建断言：“所谓孙武，全为伪托之说。”^①进而认定《孙子》一书为孙臆所著。日本学者斋藤拙堂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孙武与孙臆，毕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臆是其绰号。”（江侠庵：《先秦经籍考·孙子辨》引录）

以上我们列举了怀疑论者的一些主要观点。那么，关于《孙子》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争论呢？关键的问题是史料缺乏。司马迁为孙子立传时已有此感，因此才会将“吴宫教战”之类的传说写进去，而对于孙子在吴国的活动和贡献，则仅仅以“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等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怀疑孙武实无其人者，主要的论据是，如果孙武实有其人且当过吴国的将军，《左传》就应该有关于他的记载。其实这只是一种

① “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臆考”，《古籍丛考》，中华书局，1941年版。

主观臆测 并没有任何根据。对此 明人宋濂明确指出：“春秋时 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 不然则否。二百四十年之间 大国者秦、楚，小国者越、燕 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 何独武哉？”^①既然春秋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远非孙武一人，那么以此来否定孙子的存在显然失之于武断。

尽管孙武之事不见于《左传》 但在先秦的典籍中还是能找到一些零星的资料的 这说明司马迁为孙子立传是有依据的 绝不会是空穴来风。现在不妨引几则如下：

“……明之吴越 言之于齐 曰：‘智 知 孙氏之道者 必合于天地。’”（《孙臆兵法·陈忌问垒》附简）

“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 而天下莫敢当者谁 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 而天下莫敢当者谁 曰武子也。”（《尉繚子·制谈篇》）

“临武君曰：‘兵之所利者势利也 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 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荀子·议兵篇》）

“境内皆言兵 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篇》）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 战国时期孙吴并称 而孙排在吴之前 说明这里的‘孙’显然是指春秋末期的孙武 而不大可能是后于吴起半个世纪之久的孙臆。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证明孙武与孙臆各有其人 且均有兵法传世 这样《孙子》作于孙臆之疑便涣然冰释。其二，《孙臆兵法》所说的‘明之吴越’与《史记》中孙武人仕于吴的记载相吻合 可资佐证。其三，《尉繚子》中‘提三万之众 而天下莫敢当者谁 曰武子也’的记载 可以作为《史记》的旁证，说明孙子确曾统兵征战且功绩显赫 只是由于史料阙如 后人难道其

^① 宋濂：“诸子辨”引自《古籍考辨丛刊》第一辑 中华书局 1955 年 11 月版

详而已。

至此 关于春秋末期有无孙武其人的争论基本结束 但对于《孙子》的成书年代 争论仍在继续。李零认为 汉简两《孙子》(指《孙子》与《孙臆兵法》)的出土并不能完全推翻对《孙子兵法》著作时代与作者的怀疑之说。从《孙子》书中所反映的战争规模、持续时间、作战样式、军事思想的内容来看 都带有战国中期的特点 并以此断言:《孙子》一书并非春秋末期的孙武亲著 而是“孙子学派”军事思想的记录 成书过程大约从春秋末期的吴国到战国中期的齐国方告完成 其中不排除孙臆参与整理的可能性“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文史》第七辑)杨丙安、陈彭也认为,《孙子》“奠基于孙武 而成于战国兵家”因为这样既能肯定《史记》所述的可信部分 又尊重了春秋时期无私人著述的事实“孙子兵学源流述略”,《文史》第二十七辑)

战国成书论的主要依据有两条:一是传统的春秋无私人著述的观点 二是《孙子》一书中杂有战国时代的某些特征。我们认为 所谓春秋无私人著述 指的是无法找到或确认某一私人著述出自春秋 以此来否定《孙子》著于春秋末期显然并不能从逻辑上自圆其说。应该承认,春秋末期已出现了产生私人著述的必要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业已为民间掌握 二是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强烈的需求。关于前一点 我们在前面已有论述 不再展开。现在我们来谈后一点。春秋末期 中国的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 其中军事领域所发生的变革表现得尤为深刻。从战争规模、作战方式到军队的成份和军事体制,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军事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即所谓的“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 频繁的战争实践迫切需要先进的理论来指导 而战争领域的诸多新变化又为兵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样,较之于其他领域,私人著述首先在兵学领域兴起的可能性便要大得多。当然,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并不等于事件就一定会发生。让我们

还是先来看看《孙子》本身吧。主张“奠基于孙武而成于战国兵家”的杨丙安、陈彭二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孙子》一书基本上反映的是春秋末期的战争情况。应该看到,《孙子》与战国时期的兵书(包括战国时期的托古兵书,如《六韬》)都有明显的不同。例如,骑兵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重要兵种,引起了军事领域深刻的变化,对这一新兴的兵种,几乎战国时期的每一部兵书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不惜花费笔墨详加论述,而《孙子》五千言对它则只字未提。又如,在对待攻城问题上,《孙子》认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带有明显的春秋时代的特征。而至战国初期,随着战争情况的变化,攻城已成家常便饭,于是墨子及墨家学派的人们便开始对城池攻防战进行深入研究,并撰成《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守城专论。此后兵家对城战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对此,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古人托古之作,并不像今天的造假者那样是为经济等利益所驱动,其根本的目的在于借古名人之声望,使自己的理论得以流行并最终付诸实践。因此,这种伪托之作,仍是立足于当时的现实的,如托名吕望的《六韬》便是如此。即使是根据古人思想整理而成的兵书,如《司马法》对现实问题也不采取回避的态度。如果《孙子》真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战国中期成书的,那么其对骑战、城战等新型的作战样式之视而不见,便是难以解释清楚的。因此,司马迁的《孙子》十三篇为孙武亲著之说是可信的。

那么,如何理解《孙子》一书中杂有战国以后特色的文字呢?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孙子》书中出现的可以确认为战国以后特色的文字是个别现象,而且如果我们将这些文字从原文中去掉,会很惊奇地发现,全书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几乎未受任何影响。这就是说,《孙子》书中杂有战国以后特色的文字,乃是在流传过程中后人窜入的结果,但个别文字的窜入并不能作为判定一部书成书时代的依据。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孙子》一书乃是孙武亲著,成书于春秋末期,但在流传、校理过程中,有后人窜入的个别字句。

其实 中国历史上 在古籍流传和校理的过程中 不仅有字句的窜入 而且还有篇章的窜入 比较明显的如《墨子》、《孙臆兵法》等。

《孙子》在流传过程中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司马迁称《孙子》为“十三篇”而《汉书·艺文志》则著录为“八十二篇”。也就是说 至汉代时,《孙子》八十二篇业已流传于世。由于《孙子》八十二篇的失传 我们已很难对它的形成下一个定论。但从汉简《孙子》来看 除传世的十三篇之外 尚有其他一些篇章 有些可以初步认定为八十二篇中的内容。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八十二篇中其他的六十九篇成份相当复杂。我们虽然不能排除这里面有孙子亲著篇章的可能性,但比例似乎不会太大。其中有相当篇幅是孙子学派记述孙子言行和阐发孙子思想之作,更多的则是后世伪托或阐释孙子思想之作。从后世的引文来看 六十九篇中杂有不少阴阳术数之类的东西 这与十三篇的基本宗旨是相悖的。从八十二篇在汉代一度传世并最终散佚来看,其他六十九篇的价值与今本十三篇当不可同日而语。今之个别好事者所谓的十三篇为传世简,八十二篇为家传简,而后者价值更甚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现在我们可以对孙子的生平及《孙子兵法》的成书及流传过程作一简略的概括了。孙子 名武 春秋末期齐国人。其先祖是陈国的公子完 因避内乱而逃到齐国 改姓田。田氏家族是齐国有名的军事世家。曾率军击退晋、燕联军且以能申明古《司马兵法》而著称的司马穰苴,便是田氏家族中的一员。孙武的祖父田书也曾任景公时率军伐莒 因功赐姓孙 从此别开一脉。出身于这样一个兵学世家 孙武很早就对军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华。成年后,正值齐国“四姓之乱”前夕 权争激烈 政治黑暗。孙武感到留在齐国难以施展自己的军事才华 更不愿因与田氏的关系而卷入内乱 于是毅然离开故乡 来到新兴的吴国 希望在此一展抱负。

来到吴国后 孙武在吴都姑苏 今江苏苏州 附近隐居下来,一面将自己研究军事的心得书之于策,一面静观时局 等待机会。在此期

间 他结识了楚国亡臣、同为杰出军事家的伍子胥 并从他那里领略了楚国军事文化的风采 这对《孙子》的写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来 在伍子胥的帮助下 公子光政变成功 夺取王位 是为吴王阖闾（也称阖庐）公元前 512 年 在伍子胥的一再推荐下 吴王阖闾终于决定召见孙武。

孙武带着自己的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并陈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吴王阖闾既为兵法的精深宏博所吸引，又为孙武的精辟陈词所折服，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任其为将，经国整军。在此后的几年间 孙武全身心地投入了吴国的图霸大业之中 不仅训练了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而且很可能参与指挥了破楚之战。至于孙武以后的活动 由于史料缺如 已难知其详了。最大的可能是 他在看到吴王夫差的倒行逆施后 感到在吴国已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 于是便挂冠高隐 潜心著述。《孙子·计篇》中“将听吾计 用之必胜 留之 将不听吾计 用之必败 去之”一句便很像是归隐原因的解釋。《火攻篇》中“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 凶 命曰费留”一句 则可能是对吴军人楚后不施仁政而反胜为败的反思。应该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修改，《孙子》的思想内容无疑地得到了新的升华。吴国为越所灭后 孙武看到自己亲手建立的业绩一朝毁灭，终于抑郁而亡。

至于《孙子》一书的流传 由于吴国的灭亡曾一度中断 以至直至战国中期以前均未见著录。直到战国中期，这一兵学巨著才得以重现于世 并迅速流传开来 至战国晚期 已经是“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的局面了。

西汉时期 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 其间涉及兵书的有三次。第一次是西汉建立之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 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 定著三十五家”第二次是汉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是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经过上述三次大规模的整理 兵书的校订、分类基本完成。任宏所分的“四种”即指权谋、形势、阴阳、技巧 而《孙子》则

列“权谋”之首。这几次整理工作对于《孙子》的流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曹操之后，注家纷起，各呈异说。注本的大量出现促进了《孙子》一书的广泛传播，在流传过程中又形成了不同的版本体系。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重要版本，计有曹操《孙子略解》（即魏武帝注《孙子》）、宋《武经七书》本、宋《十一家注孙子》本、银雀山汉墓竹简本、日本樱田本《古文孙子》等。

《孙子》一书尽管版本繁富，流传甚广，但穷本溯源，不外乎三大体系：汉简本、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

汉简本，即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子》。系迄今为止发现的《孙子》最早的手抄本。据专家考证，汉简本陪葬的年代大约在西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至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之间。而从字体风格来看，当抄写于秦至文景时期，比《史记》的成书至少要早数十年以上。汉简本因其古老，与传本在文字上又有许多差异，故显得弥足珍贵，特别是在校勘传世本时具有很大的价值。

武经本，即指宋刻《武经七书·孙子》。由于《武经七书》是作为武学的教材刊行的，所以武经本问世后便得以广泛流行，迄至明末清初一直占主导地位。历史上属于武经本系统的主要传世研究著作有：金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孙子》、明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孙子直解》、明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明黄献臣的《武经开宗·孙子》、清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孙子》等。

十一家注本，即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现存上海图书馆藏本和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本，是传世《孙子》书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宋史·艺文志·子部》载有三种从属于十一家注本系统的《孙子》集注本。十一家注本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社会上影响并不大。这一状况至清代得以改观。著名学者孙星衍以华阴《道藏》本《孙子集注》为底本，对十一家注本作了一番认真细致的校订考辨工作，使

之名声鹊起，一举打破了自宋以来主要以武经本流传的局面。孙校《孙子十家注》也因此而成为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同时也最敷实用的《孙子》读本。

对于《孙子》版本流传的三大系统 可以说是优劣互见 很难一言以蔽之。武经本与十一家注本作为传世两大体系，可以说是各有优长，也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对此历来学者论述颇多，恕不赘述。汉简本因其年代久远而弥足珍贵，但也并不像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更接近于《孙子》的原本。因为刘向、任宏等人在校勘时 是综合勘比了众多《孙子》古抄本 通过多方徵考 择善而从而成本传世的 因此从总体上说，传世本的质量当较汉简本为胜。故而汉简本可作为校勘时参考，切不可过于迷信，若以此来否定传世本的价值似不可取。

三、不朽的兵学圣典

——《孙子》兵学体系

《孙子》一书凡十三篇 依次为 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和用间。这十三篇既彼此独立 又前后照应 全书结构严谨 浑然一体 构筑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精美恢宏的兵学体系。尽管人们对这一体系的认识和理解千差万别 但对其本身的存在则殊无疑议。

早在唐代 李筌在注释《孙子》各篇篇题时 便注意到各篇的相互关系，并进而认为十三篇的排列顺序表明它本身就有着完整的体系（参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李筌注）南宋时期的张预、郑友贤也认识到《孙子》兵学体系的存在。如果我们将张预对《孙子》各篇篇题所作的注稍加整理，便可以得到如下一段文字：

用兵之道 以计为首。计算已定 然后完车马 利器械 运粮草，

约费用 以作战备。计议已定 战具已集 然后可以智谋攻。《形篇》言攻守，《势篇》说奇正。善用兵者 先知攻守两齐之法 然后知奇正；先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知虚实。奇正自攻守而用，虚实自奇正而见。军争者 谓两军相对而争利也。先知彼我之虚实 然后能与人争胜。变者 不拘常法 临事适变 从宜而行之谓也。凡与人争利 必知九地之变。知九地之变 然后可以择利而行军。凡军有所行 先五十里内山川形势 使军士伺其伏兵 将乃自行视地之势 因而图之 知其险易。故行师越境 审地形而立胜。用兵之地 其势有九 是谓“九地”。以火攻敌 当使奸细潜行 地里之远近 途径之险易 先熟知之，乃可往。用间之道 尤须微密。欲素知敌情者 非间不可也。

郑友贤则指出：“求之而益深者 天下之备法也 叩之而不穷者，天下之能言也。为法立言 至于益深不穷 而后可以垂教于当时 而传诸后世矣。儒家者流 惟苦《易》之为书 其道深远而不可穷 学兵之士 尝患武之为说 微妙而不可究 则亦儒者之《易》乎 盖《易》之为言也 兼三才 备万物 以阴阳不测为神。是以仁者见之谓之仁 智者见之谓之智 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为法也 包四种 笼百家 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 巧者见之谓之巧 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学者见其说之有遗 则始信益深之法、不穷之言 庶几大《易》不测之神矣。”（《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遗说并序》）

在郑氏看来，《孙子》就象儒家的经典著作《周易》那样 博大精深 包罗万象；“求之而益深”，“叩之而不穷”是“天下之备法”人们是永远无法穷尽其高深奥妙之道的。它“包四种 笼百家”涵盖了兵家学说的一切理论 换句话说 便是《孙子》一书构筑了一个内容完备、理论精深的兵学体系。

英国著名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为塞缪尔·格里菲思英译本《孙子兵法》所作的序言中说：“在《孙子兵法》这部篇幅不长的书中，我 20 多部书中所涉及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几乎包罗无遗。总之《孙子兵法》是研究战争的最佳入门捷径 又是深入全面研究战争问题时